



越过海峡的 传奇

新世纪出版社

越过海峡的传奇

姜玉玲 编

新世纪出版社

越过海峡的传奇

姜玉玲 编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75印张 270,000字

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050册

书号8430·27 定价2.00元

编者的话

李大维、黄植诚、黄益腾（阿原）、侯德健、谢雨辰……这些人的名字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。这个集子中收集的文章，就是描述他们脱离台湾当局回到大陆的传奇经历和在大陆的工作、贡献和幸福的生活情景。在台湾，他们都有优越的职业、丰裕的收入，可是，为了促进祖国的统一、人民的团聚，他们毅然回归，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热烈欢迎。通过这些文章，读者可以领略到台湾的风土人情和了解一些社会现状，也可以倾听和感受到台湾人民盼望祖国统一、亲人早日团聚的强烈心声和诚挚感情，更可以预见到海峡两岸人民统一和团聚的美好未来。

目 录

回归者的心声·····	李大维 (1)
中国心·····	刘亚洲 (24)
——李大维口述：一位台湾少校的故事	
黄植减少校·····	刘亚洲 (174)
真正的“本原”·····	刘进元 (326)
——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阿原回大陆	
而今我相信·····	理 由 (335)
——记《龙的传人》作者侯德健	
来自台湾的电影家·····	李 元 (347)
——记谢雨辰一家	
团圆之后·····	刘 茵 (359)
——记杜聿明夫人曹秀清	
在母亲的怀抱里·····	韩素琴 谢然浩 (377)
——记台湾回归青年周振德	
一个台湾水兵在大陆·····	孙云晓 (388)
子报母恩望繁荣·····	林 祁 冯秉瑞 (397)
——记从台湾归来的企业家陈尝经	
“因为我是中国人”·····	王相宜 (415)

回归者的心声

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学校副校长 李大维
原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

一、我和我的家

我驾机起义回归祖国，在台湾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。有人说，我同台湾当局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，这话自有它的道理。因为，我在台湾的家是非同一般的，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“军人世家”。我父亲李鸿图，早年曾在戴笠手下做事，去台后先在国民党军五十八师任上校情报科长，后任阳明山警察分所所长，专门负责对张学良先生的“监护”。一九五二年，我才一岁，父母因感情不合分了手，母亲改嫁我现在的继父刘舜元。刘舜元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毕业生，今年六十八岁，曾任台湾南部地区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、总统府中将参军，现已退役，在台北当寓公。我岳父原先也是军统的人，曾任联勤总部政战部上校副主任，我岳母是军中雇

员。我有些亲戚也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人。我姨父曾在国民党军中干到少将副军长，他最要好的朋友是现任国民党参谋总长郝柏村。我大妹妹的公公是已卸任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、四星上将刘安琪。

总之，我这个家庭在台湾属于“上乘”家庭之列。我的父辈们为国民党卖命一生，脑子里全是“为党国效忠”一类的思想，人们称之为铁杆军人。至于他们的子弟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代，军人就更多了。我大弟弟是空军中尉，小弟弟在陆军官校读二年级，二妹是国民党政工干校艺术系毕业生，大妹夫在金门一个师里当炮兵指挥官。象我们这样的青年军人，正是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力量，用有些人的话说就是“主战力量”，是国民党竭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。这些人，或许和父辈一样，也会成为“铁杆”，至少也是国民党觉得可靠的人。

就我自己而言，在台湾青年军人当中又要算是佼佼者了。我一九六八年参军，陆军官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山寨训练中心受训，因成绩优异留在那里当教官。一九七二年，我报考陆军航空队，又以第一名的资格入选。学习一年飞行后，分到陆军总部航空队任飞行官，一九七五年升为上尉，一九八〇年升为少校；一九八二年调到陆航一大队任观测中队分队长。我在国民党军中十五年，各方面都名列前茅，曾两次当选为“国军英雄”，受到蒋经国的接见。台湾的《青年战士报》还用很大篇幅介绍过我的情况，登了我的照片。

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我有一个地位那么显赫的大家庭，用祖国的话讲，就是“高干子弟”了；我还有一个美满温暖的小

家庭。内人毕德荟，三十一岁，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，现任“代安贸易公司”的经理，主要从事国际贸易。我们自己的花园洋房，有小汽车，还有一个可爱女儿。我的月薪是二万六千元（新台币），比台湾一般军人高出一万元。至于我妻子的钱，那就不好说了，她是个经理嘛。

这样的家庭环境，这样的人事背景，这样的生活条件，却出了我这样一个叛逆，台湾当局怎能不震惊呢？据说，在我回归祖国以后，台湾当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专门调查我的情况。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抛弃优裕的生活条件，忍受与家人离别之苦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驾机飞回大陆。我想，这大概也是祖国同胞们希望知道的吧？其实，我根本不象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，是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。在台湾，我既有前途，也有“钱途”，真是什么也不愁的。何况妻子已在美国为我安排好了职业，等我今年退役之后合家迁美。但我认为人活着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和吃喝玩乐是极可耻的，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奋斗、不断追求，在于为民族、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而在台湾，这种抱负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我就是因此对台湾当局一天比一天失望了，最后，终于抱着寻求真理的决心，毅然飞回大陆。台湾当局也许会说，我这样做太对不起他们，我则认为是对不起祖国，对不起人民。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宝岛搞得那么乌烟瘴气，到处政治腐败、社会糜烂、道德沉沦，任何一个有良心、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能够容忍，我尤其看不下去。我之所以回归祖国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台湾当局一个当头棒

喝，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唤醒台湾青年，促使那些和我有共同见解的人们也早日行动起来，去寻求一条真正的出路。

二、我看台湾

今日台湾究竟是什么样子？这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。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。

由于我的家庭背景，我在台湾接触到很多高阶层的人，政界的，军界的，商业界的，警察界的，我都接触过。我对台湾的反感也就是首先从对这个阶层的认识开始的。首先谈谈台湾的政治结构。台湾的政治结构很奇怪，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民大会，但这个大会从不进行改选，只搞所谓“增额”，国大代表和委员们都是三十几年前在大陆选出来，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，人们讥为“万年国会”。每逢开会时，举目一片老朽，不是这个把假牙掉在地上，就是那个因找不到拐棍而无法行走。拥有一千张椅子的会堂，坐人不足四分之一。这些人平时不办公，不做事，开会时哼哼哈哈一下，从不提什么切实合理的建议。更可笑的是，现在台湾有“国大代表”1112人，其中91人常住国外，不少人拥有居住国的居留权，有的甚至具有外国国籍。这些入了外国籍的国民大会代表，真不知道他们所代表的究竟是何国国民！而由他们所组成的“国大”，也真不知道究竟是何国的“国大”了！然而尽管如此，台湾当局却不敢解散它，因为台湾的总统要由这个国民大会来选；如果不是这样，而是让老百姓来投票，现任

总统肯定会高票落选。因此，台湾当局要保住现任总统的宝座，就必须千方百计维系这个死气沉沉的机构。

至于地方政府（县、乡、镇、市），表面上说是自由选举的，实际上纯粹是贿选，换句话说就是用钱买官。当选者几乎清一色是有钱人，真正有才学、道德高尚、公正的人连边也沾不上。那些人为当官作了出血筒子，一朝权在手，就要大捞一把，于是利用手中的特权做生意，大搞特种经营：开色情理发店、按摩、宾馆；开地下赌场；勾结官商围标……只要有利可图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正是这种恶势力与金钱的融合，使台湾政治变得腐败不堪。

政府是这样，执政党即国民党又怎样呢？那更奇怪了。有人说，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不复存在了，而今在台湾更流行的一句话是：“国民党实际上也不存在了。”人们在谈论国民党时，总爱用一种讥讽的口吻，象谈笑话一般。难道这不是一个笑话吗？这样一个小集团，盘踞在几个海岛上，居然一再声称自己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拥有统治权。前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每次向政工人员训话时，总是说：“同志们要好自为之。台湾小，你们无法施展抱负，将来回到大陆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管理一个省、一个市、一个军区。你们将成为县长、省长、司令……”真把人笑死了。国民党连自己都管不好，却妄言要管大陆，岂非痴人说梦？在台湾，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国家在心上，国民党在纸上。”意思是，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已逐渐失去它的作用，因为人们普遍地唾弃它。很多国民党员到死也未参加

过一次小组会，只要按期交纳党费就可以了。还有些人则是在进行所谓“选举”时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员，因为那时会有些党工（专门做党务工作的人）跑到他们家里去，授意他们投某某人的票。

台湾政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实行家族似的封建集权统治。马璧教授曾对台湾的所谓“三民主义”作了新的注解，其第一条便是“家族主义”。有一次，我听一位大学生说：“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蒋介石是唯一成功地吧政权交给儿子的人。”我听了受到很大触动。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我的父辈们早就有过类似的议论。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，蒋家的一贯用人标准是重臣不如家臣，家臣不如外戚，外戚不如血亲。再者，用奴才不用人才也是蒋氏传家的法宝。过去，就连宋美龄也有一个专属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师，号称“美龄师”，升迁调动，驻防关饷，概出她一人之手，谁也休想过问。在台湾，海、陆、空三军官校的门口都有这样一条标语：“领袖、主义、国家、责任、荣誉。”“领袖”赫然排在第一位。蒋介石死后，蒋经国对官校学生们讲话时说：“领袖过世了，你们就是领袖留给我的遗产！”现在，蒋家的第三代也已纷纷窃据重要部门。蒋孝武、蒋孝勇、严孝彰、蒋彦士，都是台湾有权有势的人物。老百姓是这样形容他们的：“这些人举起手来，至少也能把天遮住一半。”这些人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陆军总司令蒋仲岭。这个陆军官校第十六期的毕业生，资历极浅不说，且无才、无功、无德，又是搞通信起家的。有人做过统计：世界上没有一个

国家的陆军总司令是通信兵出身，只有在国民党内才发生了这种奇迹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：“一表三千里”。真是一点也不假啊！蒋仲岭就因为蒋家的亲戚，所以从上校干到上将（国民党军最高军衔）只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。这又是一个奇迹。我认为，蒋家这样搞，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。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治就是封建政治。我生长在台湾的所谓“上流社会”中，对这些东西看得很多，越看越生气，越感到窒息和愤怒。

说了台湾的政治状况，再说说台湾的社会状况罢。当今台湾社会，实在糜烂得令人寒心。我常听人这样说：“台湾是太平洋中污染最厉害的地方。”这是台湾社会状况的极真实的写照。上个世纪，荷兰人把台湾比喻成一口缸，缸里盛满清水，取其未开发与富饶之意；而今，这口缸里的水已混浊不堪了。

台湾的社会风气坏到了极点。

有人把这一点归咎于受西方的影响，我认为有些片面和简单。台湾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是与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腐败息息相关的，从根本上说，则是由国民党的腐败所造成的。

概括地说，台湾社会有三多。

一是经济犯罪多。

台湾的社会制度是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“混血儿”，代表着官僚们和资本拥有者们的利益。这个利益是什么呢？可以概括为一个字：钱。台湾的整个国家机器都是为着我而转动的。“有钱乃大”。钱意味着权，意味着一

切。在台湾岛的每一寸土地上，都散发着冲天的铜臭。正因为如此，经济犯罪比比皆是，特别是贪污成风，高级官员贪污，中等官员贪污，芝麻大的小官也贪污，甚至连警察、税务人员和县政府的办事员也不例外。说实话，我非常同情后面这些人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他们不得不这样。一个警察，月薪只有一万二千块钱台币。市区房租贵，郊区便宜一些，也要六千块。水、电瓦斯费算在一起一千块。一家三口人，吃饭最节省也要四千五百块，这个水平在台湾算是苟延残喘了。台湾吃的东西多，但价钱很贵，一斤青菜二三十块钱，一斤肉九十多块。小孩上幼稚园要交学费，中午吃点东西也得交钱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应酬，红白帖子送来，一出手就是一千、二千、一个月来那么两三张，真能把人吓得脸都变黑。所以，这一万二千块钱，他怎拨弄都不够，那就非贪污不可了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在那个社会里，要想办成一点事，不用钱做敲门砖是不行的。因此，“送红包”极为盛行，已成为台湾一大时弊，人们戏称之为“国习”。尽管当局三番五次下令制止，说这是“送臭包”，其实，每个人，包括当局的头脸人物在内都很清楚，谁也没有真心认为这包是臭的，相反，倒是官越大越喜爱它。

二是流氓多。

每一个初到台湾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，这里的治安状况差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：暴力事件无日无之，暴力手法不断翻新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犯罪目标日益政治化，使弥漫在台湾的暴烈之气更加浓郁。一位西方记者访问台北时，发

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：所有的楼房，五层以下全是铁门铁窗，平房就不用说了。只此一斑，已足可见出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。国民党说台湾的天是国民党的天，事实上，在他们的天外还有一层天，这就是多如牛毛的黑社会组织。黑社会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纪律，渗透到任何一个角落。有这样一件事情：陆军中某下级军官调到一个新单位去，他是青帮的成员，按照“老爷子”的吩咐去和那个新单位的“弟兄”联络。与“弟兄”见面时，他惊黄了脸，似乎看见太阳从西边升起了。原来，“弟兄”竟是那个单位的主官，堂堂中将！直到双方打出的暗号准确无误，他才明白并非在梦中。某四星上将的夫人，也是帮会成员，甚至亲自主持一个山头，广收门徒。军中尚且如此，社会上的情形如何，就不难想见了。一家报纸说在台湾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帮会。这话一点也不过份。平日上街，你经常可以看见在身上刺龙画虎的帮会流氓，有的还在背上刺只大老鹰，在腿上刺个裸体女人。他们为所欲为，无恶不作，却从来无人敢管。那么警察呢？也不敢管吗？不是不敢管，而是根本不管，因为事实上警察一直和黑社会沆瀣一气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台湾共有两大管区，一谓地上管区，一谓地下管区。前者属警察，后者属帮会，二者交往甚深。帮会流氓活动时，警察的眼睛便好象失明了，天大的事也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。更有甚者，有的警察还公开保护帮会分子。当警察来到帮会分子作案的地方时，只要笑咪咪地摘下警帽，帽口朝天就行了，离去时，帽子里一定塞满钞票。台湾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帮

会流氓呢？重要原因有这样几个：首先是社会上贫富悬殊，由此必然产生仇恨。许多穷苦青年感到彷徨无助，便在暴力中寻求满足与发泄。“你有钱，我有拳头”，“鬼都怕恶人，你有钱人不怕？”这是从许多有叛逆性格的青年心底发出的共同呼叫。其次是教育质量低劣，青年升学率低，失学又失业的青年们只好游荡街头，步入歧途。再其次是社会风气严重污染，毒害了大批青年的心灵。

三是色情多。

妓女户在台湾是公开的，有甲、乙、丙三种。还有舞厅，在台北就有十几家，由政府抽税。至于政府未立案的地下舞厅，台北至少有五十家以上。甚至连宾馆、理发店都经营此道。宾馆不仅出租房间，还出租女人。理发店全部是十八、九岁至二十七、八岁的女人。她们穿着紧身衣服，浓装艳抹，花枝招展，理一个发要二百八十元台币，理完发还要按摩……色情的毒菌无孔不入，而当局从不认真制止，还把它当作一种“无烟工业”，借此来吸引外国佬。日本人每年有几十万去台湾旅游，其中大多是去玩女人的，他们说：“台湾是男人的乐园！”美国人也说：“台湾真好玩！”我听到这些话，心碎了……按人口比例算，台湾的妓女之多可以说在全世界占了鳌头，“五十万大军”这个数字，还是保守的，只会再多，不会再少。翻开台湾的报纸，有关妓女的广告多而醒目：“纯学生”、“伴友”、“卖花瓶”……这些字眼本身就系一个个酡颜承笑的女子。或者干脆是“先生们来吧”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妓女的成份更是多种多样：上至大学生、电影明星、歌星，下

至中学生、女工、主妇。要雅有雅、要俗有俗，你随便挑选就是！近几年来，由于家庭趋于崩溃，道德沉沦的问题变得日渐严重，一出悲剧由此而酿成。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：某市一个政府职员因官场失意，心情郁闷，便到娼寮寻求解脱。当“应召女郎”来到他面前时，他的脸登时变得象纸一样白。那浓装艳抹的“应召女郎”，竟是他的正在读高一的女儿！父女在此相见，如受雷击，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！原来，他女儿在读初中时就认识了一些流氓，慢慢地被他们带坏，结果不由自主地落入了风尘。她接一个客人赚八百块台币，自己留三百，其余的要拿去养活流氓。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！当父亲的知道了这些情节，特别是听说女儿有时一天接客高达二十七人时，几乎痛不欲生，大哭着说：“我来‘钓鱼’（逛妓院的专用语），却钓到了自己的生女。我干脆把自己的一颗心从胸膛里钓出来算了！”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故事呵！我听说时，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而同类性质的故事，在台湾真不知有多少！要知道，今日台湾是没有净土的；日本和美国也没有！那么，世界上什么地方有净土呢？有一次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前年和一位外国商人交谈时，我问他：“你喜欢北京吗？”他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好，我不喜欢北京。”我很纳闷。他倒是很坦率，随即说明了原因：“北京的生活太单调，晚上睡觉太寂寞。”我听了感触良多，禁不住在内心赞叹道：我们的祖国多么健康！

下面，我再着重讲讲军队的情况。国民党的军队是一支危机重重的军队。危机并不在于武器装备的落伍和美国军援

是否能够持久，而在于信仰与理想的破灭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，维系军队士气的是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：反攻大陆。七十年代以后，这个口号消声匿迹了。谁都明白的所谓“反攻大陆”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。国防部里的“反攻作战案”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悄悄变成了“海岛自卫案”。虽说至今仍有与大陆“终必一战”的说法，但我接触了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，从未见过再提“反攻”这两个字的人。整个军队的士气低落之至，特别是在特务式的统治之下，更是如此。王升最善于搞这套东西。我听继父说，王升打击军事将领的手段非常毒辣。他刚出任总政战部主任时，常到将领家中串门。当时，台湾的生活还很苦，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接着便送去一套很高级的沙发。几天后，他又故意带着蒋经国或蒋介石到这个将领家去。蒋氏父子一见屋里摆着如此高级的沙发，心里老大不满。王升就是采用这种上烂药的办法为自己擅权扫除障碍，真叫人想起来就胆寒。今天，这种作法当然已不适用，但是在军队中实行特务式统治的宗旨并没有变。在国民党军中有一种专门向上告密的人，叫作“政治细胞”，象鬼魂一样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无处不活动，既令人生畏，更令人切齿。在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中，可能就有一个是细胞，或者两个都是，从而形成了你监视我，我监视你的局面。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：在最基层的作战单位里，竟有直通总政战部的细胞，而主官对此一无所知。在台湾军队里，搞政工和当特务几乎是同义语。我们对这种人极其痛恨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陆航的军事干部曾私下规定：谁与